

辛弃疾南归临安初期探析

公元1138年，伴随金人铁骑南下，宋高宗赵构与其风雨飘摇的南宋朝廷正式定都临安。这块今名杭州的土地自此成为时人仕宦羁旅的重要转折点与挥毫泼墨时的复杂情感载体，这对生于两年后又在二十三岁时“缚安国献俘行在”的山东青年辛弃疾而言尤为深刻。本文尝试以辛弃疾初到浙江时期的经历与作品为切入点，考察浙江这一政治与文化场域如何影响其心态转变，并由此窥见这位“词中之龙”起伏跌宕而终未得志的一生轨迹。

在进入浙江之前，辛弃疾的成长与早年经历已深刻地打上时代烙印。他出生于金人统治下的中原地区，自幼受祖父辛赞的爱国思想熏陶，长期处于战乱与异族政权统治的现实环境之中。这一特殊背景，使其早年即形成强烈的家国意识与恢复中原的理想，并在成年后迅速由书生转入实际行动，参与抗金起义。南归之时，辛弃疾方结束深入敌境、擒获叛将的人生高光阶段，正处于“壮岁旌旗拥万夫”的自我认知之中，智勇兼具，对在南宋朝廷施展抱负抱有明确而迫切的期待。

正是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辛弃疾进入了以临安为中心的浙江政治空间，并很快尝试将自身的军事判断转化为现实政治主张。其时宋孝宗即位，起用主战派张浚主持军政，一度为主战意见提供了表达的契机。据《朱子语类》记载，辛弃疾曾向张浚系统陈述分兵牵制、集中精锐、乘虚直取山东的战略设想，指出金人调发迟缓、兵力易被分割的结构性弱点。然而，该建议终未被采纳，张浚亦因符离之败而遭贬斥。自此，主和派重新占据朝廷主导地位，辛弃疾也因鲜明的主战派立场和突兀的外来出身，被迫长期辗转于政治边缘，其集中体现其战略构想的《美芹十论》亦未能进入实际决策层面。

这一时期辛弃疾词作存世较少，或许与当时其政治身份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他刚刚南归，正处于政治实践的关键时期，需要处理参与军事和地方事务的责任，这使他无暇进行大规模文学创作；另一方面，他在南宋体制中地位边缘，政治抱负受挫，许多创作可能未被官方保存或未广泛流传，因此现存作品数量有限。尽管如此，这些有限的作品仍高度反映其政治处境与心理状态。《汉宫春·立春日》作于南归后的第一个立春，表面描写春景，实则通过“无端风雨”“清愁不断”“朝来塞雁先还”等意象，传达对未来行动机会易逝的焦虑，显示其尚在积极期待政治抱负实现的心态。《又过了清明寒食》作于江阴，前片“一番风雨，一番狼籍”暗指符离之败，表达政治失意后的隐痛与无奈。随后在建康所作的《满江红》《念奴娇》等词，虽已显出豪放气势，常用江山景物、历史兴亡寄寓现实无力感，但仍未完全脱离现实政治，其创作功能主要是对政治挫败的心理调适和抱负未遂的文学反映。

与其成熟时期的作品相比，这一阶段的词作在情感张力和意象运用上更偏向直接与

现实处境呼应，豪放气韵尚不及后期作品那般激烈，也缺乏晚年词中常见的历史哲理反思与人生沉思。成熟时期的辛弃疾，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已能够将个人情感、国家命运与历史意识融为一体，情绪的波动更为宏大、意象更为深远。这一对比显示，初入浙江时期的年轻辛弃疾，词作仍紧密系于现实政治，其豪放与激烈多以现实行动的期待和失落为基调，而非晚年那种对历史兴亡的深层反思和人格化的情感寄托。

总而言之，初入浙江的辛弃疾，既带着南征北战的经验和复土抱负，又面临南宋主和派的政治现实。他的军事主张未被采纳，政治行动受限，后来长期被边缘化的政治生涯已隐约展露獠牙。与此同时这一阶段的词作精准折射出他对时局的敏锐观察与心理波动，卓越的文学才情初露锋芒、映照出其一生中政治与文学交错的轨迹。

不知这位一生与杭州缘分匪浅的稼轩居士在写下“万事云烟忽过，一身蒲柳先衰”的再后来辞拒韩侂胄赴杭州征召之际，是否会回忆起自己年轻时怀揣壮志踏进临安那一刻。彼时，王朝运势渐衰，而一代词宗的文学生命，却悄然升起。

参考文献

1. 邓广铭. 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2. [宋]辛弃疾 著; 邓广铭 笺注. 稼轩词编年笺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